

青年之声

如今全球青年人口达到历史高位，我们也见证着漂着的这代人。随着不少年轻人逐渐步入成年人的行列，他们想要学习一门手艺或者找到一份有保障且稳定的工作的梦想却变得难以企及。这并非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认为这代人迷失了自己。相反，他们一直遵循社会准则，期望获得经济独立和幸福的人生。他们在学校接受教育，希望成为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一员，然而工作岗位的匮乏或者现有工作岗位对技能的要求与其自身拥有的技能不匹配阻碍了他们的发展。他们中的部分人离开家乡前往大城市，甚至出国，以寻找更好的机会，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现实却证明了他们的梦想虚无飘渺。

从开罗的解放广场到马德里的太阳门广场，各地的青年抗议经济机会的匮乏。很明显，体系已经崩溃，但是无人知晓该如何修复。以下是六个年轻人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青年的心声。



阿哈默德·哈桑，埃及开罗。

革命者，埃及

阿哈默德·哈桑本质上是一个革命者。然而这个年仅25岁的埃及年轻小伙子怎么也想不到在自己的国家会爆发革命，而在2011年1月25日那天却发生了。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革命爆发的最初日子里在解放广场上要求提供安全保障的主要责任者之一，而这成为他恢复自信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哈桑说：“显然，我在革命之前是个和现在完全不同的人。但参加革命之后，我能够批评任何一位官员，并要求对那些我认为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任何不好的事情进行变革。我将一直从自由当中汲取力量，继续到广场示威，直到人民的愿望得以实现。”

哈桑在家排行老二。姐姐已经嫁人，这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弟弟即将从开罗的一家商学院毕业。他的父亲在他六岁那年去世，从此哈桑的母亲成为家里唯一的支柱。她在开罗最古老，同时也是最贫

困的地区——舒卜拉海租了一家小商店，靠卖蔬菜为生。

哈桑在父亲去世后一年便开始工作。他的母亲每天都让他到市场去上卖柠檬。哈桑会把收入的绝大部分交给母亲，自己留下一小部分用于购买学习用品和衣服。

“我生来对生活就没有什么选择的权利。一直以来，我就是周围环境和命运的囚徒，”哈桑沉思着。

哈桑的成绩很好，能够进入教育学院深造。然而，由于付不起学费，他勉强同意进入一家大专院校学习新闻专业，为期两年。

超过 25% 的青年失业率使得数百万的埃及年轻人对生活的满意度极度匮乏。根据人口理事会 2009 年有关埃及年轻人的调查，15—29 岁的男青年中有 30% 想要移民，其中大部分是移往富产石油的海湾国家，因为他们预期在国内找不到工作。哈桑原本也打算这样做，如果没有爆发 1 月 25 日的革命的话。

造成年轻人失业的部分原因是招工单位所要求的技能和青年所拥有的技能之间的不匹配。雇主们频繁地指出，求职者缺乏合适的技能约束了他们招聘人才。同时，那些高学历的青年失业率当前是最高的，这也意味着教育体系没能培育出拥有合适市场技能的人来。

哈桑说：“我很绝望。在革命爆发前几天，因为和经理吵了一架，我被老板炒了。这位经理支持贾迈勒·穆巴拉克当总统，成为父亲的接班人。”当时，他在一家无线电话公司担任销售代表。

“24 天来我没有事做。我想过去国外旅行，直到听说年轻人打算在 1 月 25 日进行示威，”哈桑回忆说。“1 月 24 日那天，我来到广场和街道上，迫切希望找到一个发泄自己愤怒情绪的机会。第二天早上 7 点，我就来到广场，并一直呆在那儿，直到总统辞职。”

如今，作为一家制作电视记录片公司兼职摄影师的哈桑梦想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受到警察的有尊严的对待。哈桑说：“导致革命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失去尊严、贫穷、腐败、操纵选举、任人唯亲和利用裙带关系的风气的蔓延。”

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哈桑仍坚持为变革努力着。■

撰文：希沙姆·阿拉姆（Hisham Allam）；摄影：玛吉·奥萨玛（Maggie Osama）。

追寻自己的目标，波斯尼亚

厄琳·伯雷斯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远大的职业目标，在波黑的最高形式法院任职。然而，从萨拉热窝大学法学院毕业两年之后，24 岁的厄琳仍在找工作、进行深造，与此同时，被退回来的求职信已经堆成小山了。

欧洲很多国家正遭受失业率高企的困扰，但对于波斯尼亚来说，高失业率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来自波斯尼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该国失业人口中 75% 的人已经失业至少两年，50% 的人失业的时间超过了五年。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递交了 300 多份求职申请，”伯雷斯科说。“我曾多次通过初次选拔，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却没有一次获得一份工作。”波斯尼亚的失业率在欧洲是最高的。尤其是那些 25 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近 50% 的人失业，他们是受影响最大的群体。



厄琳·伯雷斯科，波斯尼亚萨拉热窝。

伯雷斯科出生在波斯尼亚的首都萨拉热窝，并在那里上小学、中学和大学。她和妈妈、姐姐一起住在一所公寓里。在她努力学习以通过最终的司法考试期间，是她的妈妈和姐姐在经济上提供了支持。

伯雷斯科充满激情地说：“自从我进入法学院以来，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刑事法官。我认为我有充分的资格胜任，并处理哪怕是最严重的刑事案件。”

虽然目标远大，但伯雷斯科说只要是和法律相关的任何工作，不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是自己职业生涯的好的起点，她都愿意做。伯雷斯科在萨拉热窝法院做了两年无报酬实习生，先是志愿者，随后能够领取伙食和交通补贴。在完成实习工作后，她并没有找到工作，尽管一直以来她都非常积极地寻找工作。

伯雷斯科认为，教育体系在按照劳动力市场所需技能来调整应授予学生的技能方面表现很差。她认为有太多的律师和经济学家。IMF的一项研究支持了她的这一观点：技能方面的巨大差距是阻碍一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约2/3的中学生在职业学校或技校注册，而这些学校提供的项目非常有限，有些甚至过时了。学生在毕业的时候缺乏一些重要的技能，包括沟通、问题解决、团队合作，而这些都是劳动力市场上最需要的。

作为前南斯拉夫的一部分，波黑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次巨变。1992—1995年的战争导致人们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基础设施被毁，GDP下降了近80%。《1995年代顿和平协议》终止了这场战争，建立起一个复杂的政治体系，而该体系却经常由于有关种族问题的政策而陷入困境。“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情况，”伯

雷斯科说。“对于像我这样的雄心勃勃的、并且为了自己的未来而投入很多的年轻人来说，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成功的机会渺茫。想要在一个经济不够强劲、政府机构薄弱的国家找到工作是非常困难的。”

伯雷斯科还谈到了腐败。在她的祖国，腐败对各个方面都造成了影响，包括失业问题。“当时，大多数人都是依靠裙带关系而不是自身的优势来获得工作机会。在多数情况下，为了得到工作，年轻人被逼行贿，”她说。

伯雷斯科希望在三月份的时候能够通过司法考试。她还会继续找工作，并希望自己的努力最终能结出胜利的果实。■

撰文：黛瑞尔·斯多—苏斯科（Daria Sito-Sucic）；
摄影：德多·鲁维科（Dado Ruvic）。

被延期的抱负，秘鲁

在利马市郊贫瘠山丘上的贫民区里，男男女女等着装满塑料盛水桶的蓝色卡车，他们必须顶着烈日将这些塑料桶拖上长长的阶梯。

2000—2010年，秘鲁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5.5%。长达10年的繁荣大大降低了该国的贫困率，但却没有光顾Flor de Amancaes，这个在岩石斜坡上布满刷着明亮油漆却脆弱的小木屋的地方。

“对于某些人而言，我想日子过得比以前更好了，但在这里你却看不到这种情况，”艾迪梅尔·加西亚（19岁）仰望着山丘上那些只有一个或两个房间的居民屋这样说道。



艾迪梅尔·加西亚，秘鲁利马。

尽管秘鲁近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收入差距仍然非常大。

加西亚在15岁时到位于秘鲁北部的皮乌拉山的自家农场帮工。在他看来，这个地方是不断扩张的首都利马的一部分，拥有光明的前景。四年后，他们搬家来到城市，家仅是一个小小的活动板房，位于城市的边缘，没有电力供应，也没有市政供水。

“我来这里是为了工作和学习，”他说。“我曾经认为这里有更好的工作机会，特别是在教育方面也有更好的机遇。”然而城市生活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成为现实。当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和兄弟们住在一起，并在两个月之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但是一周六天的全职工作让他无暇顾及学业，而且他也无法再返回学校上学了。

最近，他在离家一小时路程的中产阶级社区的一家玻璃刀商店打工，每周工作60个小时，报酬是75美元，但没有任何保险和福利。不过在2011年年底，工作没了，他又开始继续寻找工作。

这一次，加西亚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让他有半天空闲时间（上午或下午）的工作，这样就能够去上学，但连他自己都怀疑能否找到这种工作。“工作是可以找得到的，但却很难找到愿意给你时间去上学的工作，”他说。

加西亚并不确定自己要做哪种类型的工作。“我想完成中学课程，”他说，“然后再看自己喜欢干哪一行。”虽然他的抱负被延期了，加西亚并不后悔搬到城市来。

“只要你工作，你就能挣到钱，这是在这里好的一面，”他说。“在农场，虽然你工作，但却拿不到钱。”加西亚并不孤独。在过去20年里，每年有近130000人涌向利马，现在利马已经成为拥有760万人口的城市。

利马原本是建在秘鲁沿海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而随着一次次居民对土地的新的要求，它早已向东朝着安第斯山山脚的岩石地区延伸，到陡峭贫瘠的山坡。居民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但改善的速度却远远低于该国GDP的上升曲线。

谈起Flor de Amancaes时，加西亚说：“四年前，这里没有阶梯”通向山坡。“甚至没有路，有的仅是一条狭窄的小道，汽车开不上来。当时的房子更小，现在都已经改造过了。这些年来，我一直生活在这里，见证了它的发展。我希望这一发展能够继续下去。”然而，他自己的梦想仍然遥不可及。

“也许在将来，我们这里通水、通电了，到那时，这将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好地方，”他这样说。“将来我想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不过现在我只想工作和学习。”■

撰文：芭芭拉·弗雷泽（Barbara Fraser）；摄影：奥斯卡·梅德拉诺·佩雷斯（Oscar Medrano Pérez）。



亚莉克莎·克雷，美国华盛顿特区。

行动起来，美国

2008年9月，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倒闭引发了全球经济混乱，当时克雷并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感到绝望。她刚刚在牛津大学完成了自己有关经济学的研究生论文，正是时候开始行动起来。

“我不认为自己是抗议者，”克雷这样说，虽然她参加了“占领华尔街”抗议示威运动——年轻人以及其他民众组织起来，反对全球经济下的经济与社会不平等。“这并非是一项反动主义活动，不过它也确实让我们重新思考如今的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的任务就是要让人们明白他们能够在经济中起到作用，进行改变，而不是麻木地被动接受。”

克雷认为，如今的青年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企业家精神以及来自于他们的职责的认同感。

“通过努力改变而了解自己，我想这对于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来说就是这样。”

克雷并不认为自己是全球经济危机的受害者。现年27岁的她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经历了自从雷曼兄弟倒闭以来的稳定就业情况——在此期间，美国的失业率从6.5%升至10%（2009年10月）的高位，随即又缓慢下降至8.5%（2012年年初）。

目前，这位自称游民的女子在一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机构，其宗旨是通过企业家精神来实现社会改革。最近，她去了肯尼亚和卢旺达，研究当地的青年失业和就业创造情况。她马上还会去印度，对非正规经济进行研究。

克雷可能在危机期间有稳定的工作，然而她十分清楚年轻人在求职方面面临巨大的竞争。“我们必须更有创意和斗志，要自己为自己创造就业机会，要知道工作可不会从天而降。”

她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全球各地的抗议活动给民众表达对当今经济体系的强烈不满提供了空间。但是，她批评说这个运动“缺乏我认同的改变的论调”。

经济学已经和重要的实际问题脱离开了，克雷说：我们应如何公平地分配资源？经济繁荣的条件是什么？

“经济理论趋向于自我参考型，并远离大多数民众，”克雷说。她希望从业者能够用更加民主的形式与大家沟通自己的看法，因为“我们的经济体系已变得非常复杂，多数民众很难参与到有关经济的讨论之中。”

克雷指出，市场自我调节的主张和个人以自我利益为重的行为在危机期间对经济的发展都没什么用，同时经济学家们现在也开始反思自己的职业以及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占领华尔街运动为民众表达对现有行事风格的不满提供了渠道，然而克雷希望进行更多的有关采取另一种行事方式的对话，包括与当权者的对话。

“占领华尔街运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使市民成为推动未来经济格局行成的真正的改革者，而非仅仅是对此次危机不满的抗议者。”■

撰文：杰克琳·德斯劳瑞尔（Jacqueline Deslauriers）；
摄影：史蒂夫·加菲（Stephen Jaffe）。



佐藤拓海，日本东京。

迷失和孤独，日本

佐藤拓海仅靠每天一包方便面活着。他说如果再收不到日本政府提供的残疾人支票的话，自己就将无家可归了。

“我是在科技大学学电脑游戏设计和生产的，毕业之后在一家制作电视动画和视频节目的电脑公司担任助理导演。”23岁的佐藤目前一个人住在东京以北的川越市的一间公寓。这间公寓只有一个房间。

“但这并不是一个全职工作。尽管如此，我每天也必须工作八个小时，而且我和公司之间并没有签什么合同。”佐藤说道。

这是越来越多的日本工作者的现实写照。由于过去几年间的经济下滑，公司的经济拮据，因此放弃了国家鼓吹的终身雇佣制和精心培养公司家庭式温暖的理想。相反，工作者们签订的是短期合同，这使得雇主所受限制更少，而工作者却没有任何保障，四处漂泊。

在日本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其社会安全网也在恶化，仅有23%的失业者符合福利发放要求。脆弱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相关支持服务的缺失导致人口的健康状态下降，甚至是自杀。

佐藤的下一份工作是为超市和便利店准备便当，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五天，月工资13万日元（1671美元）。这份工作他只干了两个月。

医生告知佐藤应该停止工作，以防止他的心理健康进一步恶化。随后，佐藤便辞去了这份工作。

这是发生在三年前的事情了。从那以后，佐藤依靠政府提供的每月11万日元（1413美元）生活，而每个月的房租就会花掉3.5万日元（450美元）。

政府为了让公司摆脱全球经济风暴而使劲浑身解数，但却对于像他这样的人视而不见。佐藤对此非常气愤。

“他们所做的并不够。他们甚至不在乎公司粗暴对待员工的情况，”佐藤说。“他们只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他们还认为雇用外籍劳工的成本更低（这些外籍劳工的要求更少并且对工作条件不会有什么抱怨），“即使他们清楚这样做很容易触犯移民法律。”佐藤说道。他之前工作的那家便当公司就引进了更多的巴西人和印度人。

根据日本一家致力于无家可归者的非营利机构Moyai的调查，日本有110万人的年收入低于200万日元（25706美元），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连房租都付不起。该调查还显示，大多数的无家可归者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

一个极端的现象出现了，就业情况导致青年退出社会，他们通常从极度孤独和封闭中寻求庇护。他们

当中的很多人几个月，有时是几年，都不愿出门。他们甚至有了自己的专属名称——“蛰居族”，意思是“宅在家里”。

“政府说，如果我们继续工作的话，只要再多努努力，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佐藤说，“我觉得我正在脱离这个社会，而且再也回不来了。”■

撰文：朱利安·莱亚尔（Julian Ryall）；
摄影：阿尔菲·古德里奇（Alfie Goodrich）。

不匹配的技能，尼日利亚

和成千上万她这个年纪的大学毕业生一样，吉奥玛·尼瓦索耶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两年前她刚毕业之后，尼瓦索耶干了一年的国家义务服务工作。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在找工作。

23岁的尼瓦索耶有四个兄弟姐妹。她在2010年毕业于达尔塔州立大学，获得地理和区域规划学位。她说，“这并不是我最初想要学习的专业。我更想读会计或者商科。”

由于当初的分数不够进入会计系，她选择了在该大学读一年预科，以保留她的入学资格。但是那年的预科项目“并没有提供进入会计系的机会，所以我选择了地理学，”她这样说道。然而在下一年，预科班又有了进入会计系的机会，这件事让尼瓦索耶一直感到非常遗憾。

每年有近100万人参加尼日利亚的大学统一入学考试，为了争夺该国95所公立和私立大学的10万个入学资格。因此，大多数年轻人同意接受任何学科的学习，就像尼瓦索耶所做的那样，而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有机会获得大学学位。

尼日利亚每年有成千上万个大学毕业生，但多数都找不到工作，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技能和市场上要求的技能不匹配。而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缺乏资金而导致教育水平的下降以及缺少合格的教师。部分雇主抱怨说很多毕业生不具备所学专业的核心专业知识。

尼日利亚这个位于非洲的人口大国，其失业率日益上升，目前已达到了24%。接受高等教育并没有提高找到工作的机会。10个毕业生里就有三个失业。

尼瓦索耶赢在了起跑线上。她的母亲是小学教师——这在她所生长的尼日利亚北部地区萨佩莱来说并不常见。根据北部教育倡议（该地区的一项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计划），在萨佩莱有43%的适龄女孩失学。



吉奥玛·尼瓦索耶，尼日利亚拉各斯州巴达格瑞。

在尼瓦索耶生长的尼日利亚南部地区，情况要好一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地区15—24岁女性的识字率只有65%，而该年龄段的男性识字率为78%。

由于从小对数字很感兴趣，“我的父母，特别是我母亲，非常希望我能够学医。尼瓦索耶解释说：“在尼日利亚，部分课程受到人们的追捧。人人都想成为一名医生或者会计师。”为什么呢？“我觉得是经济的原因。很多人认为学医或会计的人在毕业后能很容易找到工作。”

目前，她决心攻读硕士学位，好让他父亲开心。尼瓦索耶的父亲在尼日利亚国有电力公司工作。

她说：“一直以来，我的父亲就明确要求我们必须读大学，而不是技校或大专。实际上，他命令我们一定要取得硕士学位，免得他抱怨我们只有大学学位。”

在这个有4000万失业青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由于重新接受初等教育而导致失业）的国家，很多人都没有进行继续教育以避免失业的机会。■

撰文：威尔·法塔德（Wale Fatade）和图鲁·欧甘勃斯（Tolu Ogunlesi）；摄影：茵卡·欧鲁巴德（Yinka Olugbade）。